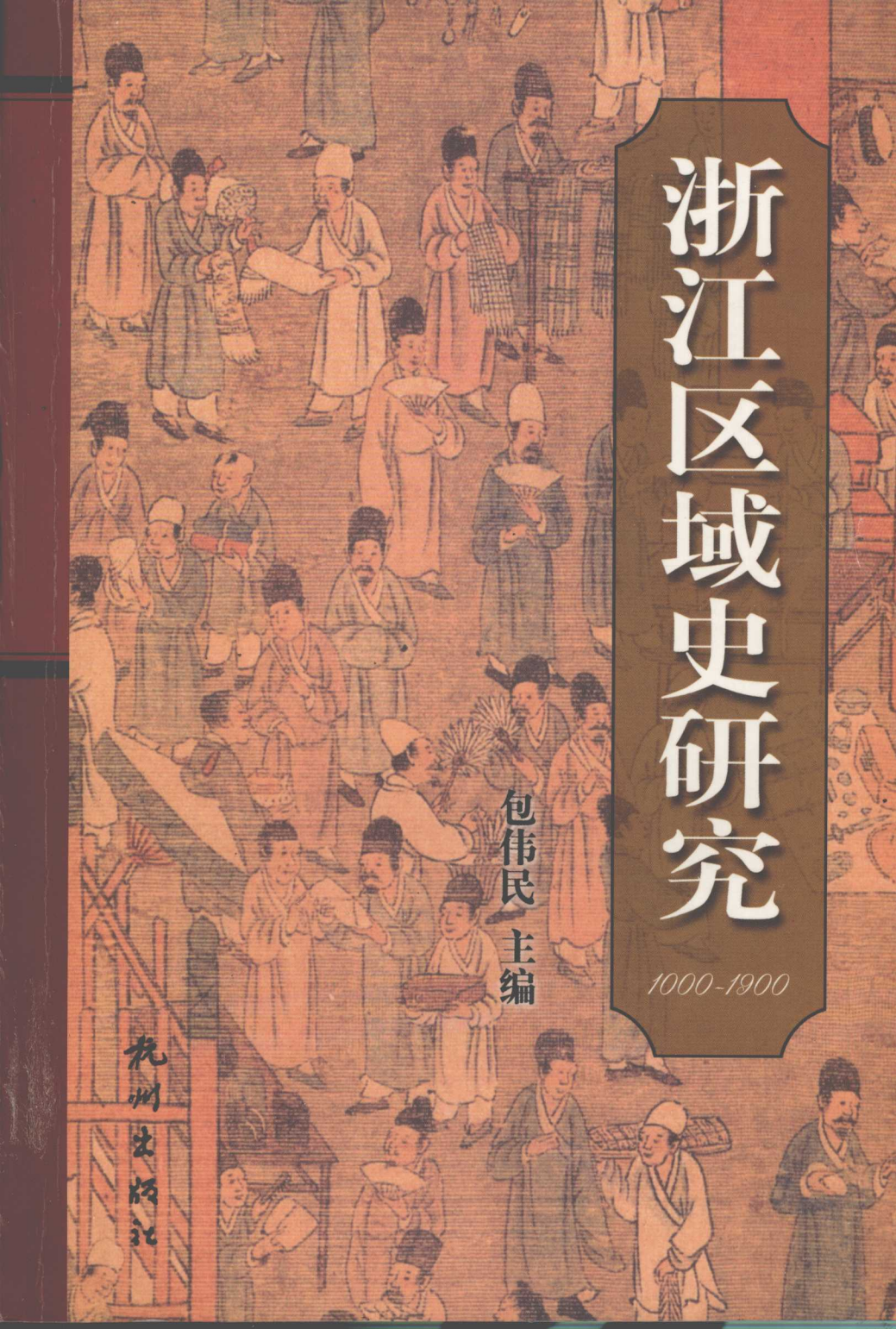




浙江区域史研究

1000-1900

包伟民 主编

杭州出版社

包伟民 主编

浙江区域

研究

1000-1900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区域史研究/包伟民主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633-601-X

I. 浙... II. 包...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浙江省
IV. F. 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738 号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 310007)

(E-mail: hzcbs@mail. hz. zj. cn)

责任编辑 吕凤棠

封面设计 张磊 赵路

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9.5

字数 495 千字

版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书号 ISBN 7-80633-601-X/F·31

定价 39.00 元

前 言

本书是一个集体研究项目的初步成果。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以区域研究的眼光来重新解读近千年来浙江地区的历史。

浙江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对它的研究按理应被归为地方史的范畴。本书试图跳出旧学术传统的樊篱，强调所谓“区域研究的眼光”，确有一些考虑。

中国作为大一统帝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这段历史不仅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也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数千年大一统的架构常常误导着我们的认识，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政治“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中央对地方可“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①所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常着眼于全国，而忽视地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学术界在教条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下，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强调研究“规律”，更强化了史学研究中重一般而轻特殊的倾向。史学研究围着泊来的理论、概念打转，结果是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著作常令人感到陌生，不真切，好像在讲一个遥远的国度。学生学了关于中国历史的课程，除了含含糊糊地记颂了一些“规律”、某某“社会性质”的解释等等之外，对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片国土的历史文化可能反而相当懵懂。

事实上，中国地域广大，江南塞北，大漠海滨，文化极其丰富多彩，脱离各区域特殊性的抽象的中国历史是并不存在的。正如随着

^①（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转对条上四事状》。

各地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如河姆渡，如三星堆，如跨湖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华古文化其实是由众多区域性文化汇合而成。这些区域性文化后世的发展也仍各具鲜明的区域特性。古人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①，职此之谓。即使是作为“海行条贯”而通行天下的国家法规制度，在其具体推行中，也必然存在程度不一的“地方化”过程。现今社会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实为国家法规“地方化”的现代翻版。在国家政治范畴之外，难以用法规来整合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之区域化，自然更为明显。

近年来，大陆史学界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反思 20 世纪史学发展的历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研究应该跳出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中心、以非本土经验为理论指导的研究范式，转向基层社会史，转向本土经验，转向真正的“中国史”。据本人的理解，重视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新世纪史学革新的重要侧面。我们只有通过一步步地解剖构成中华历史文化的各核心区域，才有可能从中比较正确地归纳出“中国历史”的一些事实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符合历史真实的理论抽象。总之，新世纪的史学再不应该靠为“理论”作注脚吃饭，而应该努力从本土经验来创立自己的体系。所以从追求普遍意义的全局性研究转向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转向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并不是指简单地从“通史”转向“地方史”而已。我们的地方史研究学术传统有一定的缺陷。地方史研究所承续的，一是地方志书编纂传统，眼光局限于一定政区范围内的史事实录，甚至是史事堆积，较少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关怀，常因后世政区疆界的限定，忽视本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全局的关联，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年近来各地政府所热衷资助编纂的省区地方通史，大都无法超越政区对学术的制约。二是流行通史模式的

^① 《礼记·王制》。

影响。地方史编纂常流为通史的“缩影”，即在流行的通史架构之中填充进地方性资料而已，表面看是地方史，骨子里仍是通史。甚至无视史实，按通史的架构来生硬地拼凑地方历史，有时不免会出现与地方经验相左的阐述。这两个侧面看似矛盾，实质是同一现象在不同角度的表现，即缺乏对地方区域历史真正深入的、旨在归纳其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特性的研究。

从方法论层面讲，“区域史研究”与传统“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差异在于，区域史研究虽集中讨论某一特定地方的史事，但其关注点却是全局性的。它是从全局的高度来注视地方史；它不仅仅关心特定地方史事的个性，更关心这些个性与其他地区个性之间的关联。它绝非是在就地方谈地方，而是在作窥一斑而见全貌式的研究。就这个意义而言，区域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法，它需要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一定的规律性”，绝不能被理解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随着对历史认识的深入，人们无奈地发现，一方面前人所留给我们的历史记载带有种种无法克服的局限；另一方面，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理解这些记载，去“写历史”，也难以摆脱自己的主观性。这就是说，所谓“历史规律”实难捉摸，理性解释模式常常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这一见解所反映的就是所谓“后现代”的史学思想。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确是近年学术发展的趋势。史学领域中区域史研究的兴起，确是上述学术思想的一种反映。前面所谓的“一定规律性”，其实就是“典型性”。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作为一个省区，形成时间相对较晚。“浙江”一词，原为水名，是钱塘江下游的名称。“盖其流曲折”，浙、折音

相近相通也。^① 所以司马迁有秦始皇“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的记载。^② “浙江”一词从区域最大河流之名转向作为区域的名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载:陈贺以舍人从刘邦起兵反秦,“以左司马入汉,用都尉属韩信,击项籍,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陵,侯”。这里的“浙江”,就已明显是在指称一个区域了。不过估计当时这种指称还不稳定。唐代分天下为十余道,今浙江之地绝大部分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在江南东道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两节度使,分割浙东、西诸州。^③ 浙江作为政区名称始于此,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划的确立,还有很长的一个演变过程。

今浙江之地春秋时属吴、越两国,后属越。战国时越被楚灭,遂并于楚。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今浙江地主要属会稽郡,还有部分属闽中郡与鄞郡。当时会稽郡治所在吴(今苏州)。西汉置十三州,今浙江地隶扬州刺史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今钱塘江以西为吴郡,浙江地分属吴、会稽、丹阳三郡(西汉元狩二年改鄞郡为丹阳郡),仍属扬州。三国以后至南北朝,各地增置州郡县较多,州、郡已无多大差别。唐代统一天下后,贞观元年(627),根据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为十五道。从此在州郡之上又形成一个大体相当于监察区的道,是为后世省区的源起。宋代改唐代的道制为路制,在原唐代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辖区置两浙路。北宋中期神宗时起两浙路曾两次将路分转运司拆开,分置浙东、浙西两路转运司,南宋时提刑、常平两个路分监司分置东、西,转运司却又合而为一,比较复杂。

总体讲,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今苏南、浙江两地原为一个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引韦昭《索隐》。

② 《史记》卷六《始皇本纪》。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大政区,此区东为海,北为江,西北至宁镇山地,西线由天目山等一系列山脉的分水岭作为与它区的分界,形成一个政区显有其地理上的合理性。若加细分,则又以钱塘江为界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以丘陵小流域、盆地为主,西区则主要为太湖流域的河网平原。自唐代置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及宋代分置浙东、浙西两路,皆如此。

元代对本区划分未加改动,于原两浙路设江浙行中书省,行省制度于焉形成。明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以京畿之地直隶京师,设一单独的政区,辖府六,州一,今苏南之地从此由江浙行省中划出,因此于明太祖丙午年(1366)在今浙江地设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浙江作为一个省区从此成立。洪武九年(1376)明廷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性质仍是省区,所以习惯上仍称之为省。十四年(1381),嘉兴、湖州两府自京师改隶浙江布政使司,浙江省域已和现在基本一致。清承明制,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共辖十一府、一直隶厅、一州、一厅、七十五县。

从上述可知,浙江省区的形成过程由于受政治的影响,与自然地理的形势并未完全相吻合。现今浙江省区各地就其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分析,其实很难笼统地将其视作单一的“区域”。具体地讲,浙江地域可分为三种类型:河网平原型、丘陵小流域型与盆地型。浙北杭嘉湖当属河网平原型,它与苏南地区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同质性,且在历史上长期属同一区划,今虽分属两区,历史的与自然的联系实难以割断。现今学术界研究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即将浙北、苏南两地视为一体。若仅从政区界限出发来考虑,单就杭嘉湖论杭嘉湖,自于学理不通。宁绍温台等地可为一类,它们皆背山面海,以河谷地带为中心形成面积不等的小块平原,传统的农业生产即从这些河谷地带开始发源,遍及整个平原地区。大致在公元1000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河谷平原地带开发的完成,人类开始进一步深入开发丘陵山区。这就是所谓的丘陵小流域型。当

然其内部相互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如温台地区,其与福建的地理类型甚为接近,互相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金衢地区另是一类,为红壤盆地,有一定的封闭性。传统农业发源虽早,后期发展的速度略为迟缓。地理上它又是沿海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因此与皖、赣等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较为频繁。

从更为广阔的一个视角来观察,自唐宋之间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直到明清,太湖流域的河网平原一直是这个南移的“中心”所在,其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本区域乃至全国的最前列,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吸引力。随着传统后期全国市场的逐步形成,太湖流域更进一步将周边地区纳入了自己经济文化的辐射范围,从而使其与自己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依赖关系。因此,前文所强调的以“区域研究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浙江近千年来地方历史,就是指在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理论思考的框架之下,对浙江省区按不同地域类型划分作一番探讨,以期归纳其不同经济文化发展的类型特征,及其与中心地域的差别比较。唯其此,才有可能对近千年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得出比前人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唯其此,才有可能使明清以来江南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显现,以臻仅从中心研究中心所难以达到的功效。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七章,第一章探讨7至10世纪间浙江区域中心从绍兴转移到杭州、即从丘陵小流域转移到河网平原地区的现象。这其实是本区形成上述中心——边缘格局的一个序幕。第二章从水利建设与区域社会体系构造的视角,探讨8至13世纪宁波地区、即甬江小流域的开发进程及其特征。第三章分析金衢地区近千年经济发展进程,并以“行担经济”这样的概念来归纳本区的独特发展模式。第四章从人口与资源互相间既利用又冲突的矛盾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前近代时期温州地区亦即瓯江小流域的发展特征。第五章跳出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以元末明初浙东(主要为金衢台小区域)士大夫参加元明易代政治活动的个案,来分析浙东士

大夫政治文化活动的区域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第六、七两章则是相对宏观的,试图从租佃制度与家庭手工业两方面,正面归纳明清时期江南中心区域——苏南杭嘉湖河网平原地区——的经济模式:江南模式。它既是作者对“明清江南经济”这个学术热点的新思考的集中表述,又兼有作为前五章比较研究对象的作用。

本书写作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全书设计有一总体架构,各章分析允许相对自由地展开,不强求一致,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各章作者的特长,以方便个案分析的深入。

鉴于本书各章的个案研究带有明显的试探性与不成熟性,全书最终的理论归纳因此暂时付诸阙如,以期待学界同行的批评,再作改正提高。

本书总体架构由本人提出,负责各章个案研究的均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具体是:第一章周祝伟,第二章陆敏珍,第三章王一胜,第四章陈丽霞,第五章董刚,第六、七两章楼大为。全书由本人统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杭州出版社吕凤棠、徐吉军等先生的热忱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包伟民

2003年7月29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7—10 世纪杭越易位与区域中心的转移	(1)
第一节 人口数量与文化素质的变化比较	(5)
一、人口数量变化的比较	(5)
二、文化教育水平的比较	(14)
第二节 辖域经济发展水平之比较	(22)
一、杭、越两州土贡内容的变化	(23)
二、杭州经济的发展及其与越州之比较	(25)
第三节 辖域县数与县等的变化比较	(38)
一、辖域县数变化的比较	(38)
二、辖域县等变化的比较	(42)
第四节 杭州“东南第一州”地位的确立	(47)
第二章 8—13 世纪宁波地区水利建设与区域社会体 系构造	(53)
第一节 区域社会体系理论	(55)
一、施坚雅：基层市场体系理论	(55)
二、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	(59)
第二节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筑	(62)
一、水系和气候条件	(62)
二、兴修水利高潮	(65)
三、主要水利工程的修浚	(80)

四、唐宋时期水利事业的特点	(87)
第三节 水利管理过程中的社会整合	(90)
一、水利事业的经营与管理	(90)
二、围(废)湖为田与复湖之议	(110)
三、水利建设活动中的民间信仰	(118)
第四节 灌溉流域与区域社会体系的构造	(124)
第三章 “行担经济”与近千年金衢地区的市场变迁	(132)
引 言	(132)
第一节 农业的生产和商品化	(134)
一、粮食作物品种的增多与耕作制度的变革	(136)
二、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	(144)
三、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特点	(159)
第二节 手工业经济的变迁	(170)
一、纺织印染业	(170)
二、造纸印刷业	(177)
三、陶瓷砖瓦和采矿业	(181)
四、食品业	(186)
五、百货制造业	(195)
第三节 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	(202)
一、交通与商品流通	(202)
二、城市、市镇与市场体系	(210)
三、商业资本与市场结构	(226)
结 语	(237)
第四章 前近代时期温州地区人地关系审视	(240)
引 言	(240)
一、人地关系:概念及理论背景	(240)
二、本章的逻辑起点及结构	(242)
第一节 区域变迁与人口发展	(246)

一、行政沿革及地理概况	(246)
二、唐宋以降温州区域开发简况	(250)
三、人口的增长	(251)
第二节 生存冲突及移民问题	(257)
一、移往他乡或海外	(257)
二、南迁和福建移民	(259)
三、灾荒与移民	(267)
第三节 区域开发和产业发展	(269)
一、人口增长与土地承载能力的提高	(272)
二、农业结构的变化	(275)
三、海洋捕捞业的发展	(281)
四、手工业的兴起	(284)
五、商业的活跃	(289)
第四节 市镇经济	(298)
一、市镇的密集化	(298)
二、赶集与赶会——市镇经济的主要形式	(301)
三、线型集镇布局：区域贸易的路由途径	(303)
结 语	(305)
第五章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	(309)
引 言	(309)
第一节 浙东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状况	(311)
一、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形成之历史背景及 其核心人物	(311)
二、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之成员构成	(314)
三、该群体主要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320)
第二节 浙东士大夫与元明易代	(328)
一、浙东士大夫在元末乱世的仕隐选择	(328)
二、朱元璋入主后浙东士大夫的矛盾心态及政治	

选择	(336)
三、浙东士大夫在元明易代中所起的作用	(342)
第三节 浙东士大夫与洪武政治	(352)
一、明建国初期浙东士大夫群体所处的地位及状况	(352)
二、浙东士大夫对洪武政治的批评与反动	(363)
三、洪武集权专制阴影笼罩下浙东士大夫之命运	(368)
第四节 浙东士大夫与建文改制	(374)
一、洪武后期浙东士大夫群体之状况	(374)
二、浙东士大夫与建文改制	(382)
三、浙东士大夫与削藩、靖难	(390)
第五节 尾声与总结	(395)
一、壬午之难后浙东士大夫群体之终结	(395)
二、永乐继统之历史影响	(399)
三、结语: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济世”实践的 成败得失及影响	(401)
第六章 租佃制度与理论框架之外的江南经验	(404)
第一节 租佃制:农业经营方式之主流	(405)
第二节 地租分益以及地租形态嬗变	(426)
第三节 “有恒产者有恒心”:经营权物权化以及永佃 制的嬗变	(449)
第四节 硬的约束和软的约束	(457)
第五节 农业薄利和租佃关系非稳定化	(466)
第七章 社会化与家庭手工业发展的独特途径	(483)
第一节 “形散神不散”——对散工制的再思考	(483)
一、对散工制经营方式的一般描述	(486)
二、生存竞争原理与散工制的优势	(491)
三、散工制·技术·小生产	(499)

四、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看江南的散工制	(505)
五、“小、少、散”的农民——散工制之坚实社会基础	(509)
第二节 集群：散与聚的二律背反	(513)
一、从“蜜蜂经济”到手工业集群	(514)
二、关于集群经济之一般描述	(516)
三、集群系统之构成	(524)
四、集群效应	(541)
五、特殊的分工模式	(550)
六、对江南集群经济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558)
附录一：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总年表(1333—1403)	(561)
附录二：参考文献	(574)
附 表：	
表 1-1 7—10 世纪杭、越两州户口变化情况比较一览	(9)
表 1-2 唐代杭、越两州进士登第情况一览	(15)
表 1-3 唐代杭、越两州各阶段进士人数统计一览	(17)
表 1-4 杭、越两州唐五代诗人统计	(20)
表 1-5 杭、越两州唐五代诗人分期统计	(21)
表 1-6 杭、越两州唐五代各个时期土贡物品比较一览	(23)
表 1-7 杭、越两州唐代县级建置变化情况	(41)
表 1-8 唐后期杭、越两州州县等第变化情况	(44)
表 2-1 秦至清代宁波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	(68)
表 2-2 唐宋间明州人口增长	(70)
表 2-3 唐宋时期宁波地区重要的水利工程	(73)
表 2-4 宋代明州水利兴修的经费及人工	(102)

表 3-1	宋代金衢地区茶叶收购和出售价格表	(191)
表 3-2	衢州地区 1949 年城镇人口统计	(225)
表 3-3	1949 年义乌县佛堂镇人口统计	(225)
表 4-1	历代温州人口变化	(252)
表 4-2	历代温州入迁移民姓氏统计	(260)
表 4-3	平阳县历代外来移民家族分时段统计	(266)
表 4-4	两宋时期温州重要的水利设施	(270)
表 4-5	清乾隆前温州市镇统计	(301)
表 5-1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主要成员(一):父 师辈浙东士大夫	(315)
表 5-2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主要成员(二):第 一代浙东士大夫	(316)
表 5-3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主要成员(三):第 二代浙东士大夫	(318)
表 5-4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主要成员(四):第 三代浙东士大夫	(320)

附 图:

图 1-1	杭、越两州地形图	(4)
图 2-1	唐宋时期宁波地区行政区划图	(67)
图 2-2	近 1000 年宁波地区水利工程分布图	(88)
图 3-1	金衢地区地形图	(135)
图 4-1	温州地区地形图	(248)
图 4-2	温州历代户数增长曲线图	(255)
图 5-1	浙东士大夫群体之间父子关系示意图	(321)
图 5-2	浙东士大夫群体之间兄弟、姻亲关系示意图	(323)
图 5-3	浙东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师承关系示意图	(326)
图 7-1	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比较示意图	(495)

第一章 7—10 世纪杭越易位与区域中心的转移

浙江地区的开发,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开发初期,其区域中心长期位于钱塘江下游南岸的山会平原,即越州地区。到公元 7—10 世纪,浙江地区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就在这一过程中,本地区的区域中心也从山会平原移易到了钱塘江下游北岸的杭州地区。本章所要探讨的“杭越易位”,就是指这两个州以及它们的州城之间在 7—10 世纪钱塘江下游地区区域开发过程中,在经济、政治地位方面出现的此升彼降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这两个地区在各个时期发展速度的不同而决定的,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变化。

杭州所处的杭嘉湖地区,平原面积广阔,在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北坍之后的今天,其面积仍有 7620 平方公里,是经过长期北涨之后的南岸宁绍平原的 1.5 倍多,平原内部地势低平,富含有机质,开发潜力很大。但由于地处杭州湾与太湖之间,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而长江三角洲又是由长江所挟带的泥沙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反曲后在西南行的过程中受钱塘江所挟带泥沙的顶托之下沉积阻滞而成的,因此其地势外围高内部低,呈一浅碟状地形。这种地形使得杭州湾上岸入侵海水以及多雨季节西部山地洪水和太湖漫溢上岸的湖水,在平原内部淤积而难泄,形成水草沮洳的沼泽地,土壤盐碱度很高,开发难度很大。而越州所处的宁绍平原,尤其是核心地带山会平原,尽管面积比北岸杭嘉湖平原要小得多,但其自南